

歷代文話續編

上

余祖坤 編

鳳凰出版社

歷代文話續編

上

余祖坤編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歷代文話續編 / 余祖坤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506-1880-0

I. ①歷… II. ①余…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26423號

- | | |
|-------|---|
| 書名 | 歷代文話續編 |
| 編者 | 余祖坤 |
| 責任編輯 | 林日波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210038 |
| 開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印張 | 66.25 |
| 字數 | 1422千字 |
| 版次 |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1880-0 |
| 定價 | 248.00圓(全三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25-68037411) |

本書出版獲華中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資助

前言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文章〔一〕與詩歌一直是創作的主流，而且與詩歌相比，文章與社會政治和人們的實際生活，聯繫更爲緊密，在士大夫的仕途和日常生活中，發揮着更爲重要的實際作用。尤其在科舉制度實行以後，文章更是直接關係到士大夫的仕途和人生抱負、人生價值的實現，因此受到歷代人們的高度重視。「在中國人的意識裏，做文章——即把想要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用文字寫下來——是人間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這樣說有些過分的話，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事情中的一件。由此而來的結果，文章作爲人格的直接象徵，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至少在已往的生活

〔一〕 本文所說的「文章」，是指在中國古代文學範疇內，除詩、詞、曲、小說以外的各種文類，它比西方強調純文學性的「散文」概念，更加契合中國古代創作的民族特點。

中，占有着極其重要的位置。」(二)古人往往在文章的創作中，表達對於歷史的反思，對政治的立場，對世道人心的關切，以及對生命的理性思考，因此，文章成爲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它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蘊藏的人文精神，及其傳達的生命意識、人格境界、審美情趣，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獨有的價值，是詩詞、小說等各種文類所不能代替的。然而，自現代學術產生以來，關於中國古代文章的研究就一直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遠不能與詩詞、小說、戲曲的研究相比。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一

造成古代文章學研究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五四」以來，文學界和學術界割斷了幾千年的古代文章傳統。「五四」文學革命使白話文成爲通用語言，徹底拋棄了「文以載道」的傳統，拉開

(一)「日」吉川幸次郎《中國文章論》，見王水照、吳鴻春編選《日本學者中國文章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五九頁。

了現代散文的序幕，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功績。但是，在當時激進和狂熱的時代氛圍影響下，文學革命倡導者的過激態度，使他們在清算古代文章的腐朽觀念和僵化形式的同時，也遮蔽和拋棄了古代文學中富有活力和價值的理念、原則和技法，導致了今人對古代文學的隔膜。所以當代學者在進行古代文章的研究時，缺乏一套有效的批評話語，致使研究只能停留在內容復述、主旨概括和風格判斷的陳舊模式之中，而不能深入剖析文章的形式技巧和結構肌理。

趙昌平先生指出，當前文學史教學和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忽視並缺乏文章學的基本訓練與素養，不善甚至不會讀詩析文，這在學生和部分青年學者中尤甚」^{〔一〕}。這種現狀，在古代文章的研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今天的教科書對於一篇古文的闡釋，大多是千篇一律的陳年老調：先介紹作者，次說寫作背景，再說本文通過什麼表達了什麼，揭示了什麼，或者說抒發了什麼樣的感情，之後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價值判斷，比如「主旨明確」、「中心突出」、「敘事生動」、「形象鮮明」、「語言流暢」，等等。如果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課堂上，就一篇古文的寫作特點向學生提問，就可發現，陳舊僵化的古文研究模式和教育模式對學生的毒害達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金聖

〔一〕 趙昌平《回歸文章學——兼談〈文心雕龍〉的文章學架構》，《文學遺產》，二〇〇三年第六期，第四一頁。

嘆曾說：「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迹，便算讀過一部書了。」〔一〕對任何一篇文章而言，遣詞造字及肌理結構才是其本體，如果研究者對文章肌理沒有透徹的理解，不要說這本身就已偏離了文學研究的審美宗旨，甚至他對文章主旨和內容的理解也一定會產生偏差。比如：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的傳贊中說：「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二〕後世的人們於是據此以為韓信謀反真有其事，而清人王又樸却別具慧眼，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司馬遷的微言大義：

夫漢王入蜀時，楚強漢弱，而信乃舍楚歸漢，登壇一對，勝負之形，如燭照數計，是明於天下大勢者，孰如信？虜豹伐趙，擊齊敗且，無不計定行師，如摧枯拉朽，是知己知彼者，又孰如信？乃楚漢相持，數年未解，而信之能，實無有出其右者。兩主之命，懸於其手，兩利俱存，鼎足可成。此等事機，明哲如信，反有不知之者乎？乃武涉說之，蒯通復說之，信不於此時反，

〔一〕（清）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見（明）施耐庵著，（清）金聖嘆批評，陸林校點《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卷首第一〇頁。

〔二〕（漢）司馬遷《史記》卷九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六三〇頁。

迨天下已集，乃謀叛逆耶？是以於武涉、蒯通兩段，皆備述無遺，而於贊內點明此意，曰「不亦宜乎」，蓋反言之耳。」^(一)

這就是說，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以韓信之才，他完全可以擁兵自立，與項羽、劉邦成鼎足之勢，但他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武涉、蒯通勸其叛漢時，他也依然沒有動搖。既然韓信在手握重兵、劉邦勢力尚弱時都沒有反叛，那他怎麼可能在協助劉邦統一天下之後謀反呢？王又樸還進一步指出：「前叙信寄食南昌亭長、漂母飯信及受辱於少年諸瑣事，後叙信之相報，一一詳寫，不少遺者，正為信不反漢作證。見信一飯尚報，況遇我厚之漢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報其怨，又豈以漢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二)按照當代的闡釋模式，一般認為《史記》中的瑣事和細節，都是為了將歷史人物寫活，刻畫歷史人物的鮮明性格。難道只要是細節描寫，就是為了將人物寫活這樣簡單嗎？顯然，這樣的理解沒有觸及文章本身的肌理。實際上，這兩個細節的描寫，主要還是為了暗示韓信根本不可能反叛劉邦。王又樸精彩絕倫的見解在其篇幅並不太長的《史記七篇讀法》中俯拾即是。比如關於垓下之戰，王又樸妙語連珠：

(一) (清)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卷二，清《詩禮堂全集》本，第三二一—三三三頁。

(二) 同上，第三三—三四頁。

於風戈鐵馬、戰苦雲深之際，寫歌，寫飲，寫詩，寫和，寫駿馬，寫美人，抑何風流婉麗也；然婉麗之中，純是一片淒切，淒切之中，又覺甚是悲壯：此真化工之筆，吾惡得而測之哉！羽以八千人起，今寫其敗，則曰「八百餘人」、「百餘人」、「二十八騎」、「亡其兩騎」、「獨籍」，此從多說至少；「斬漢一將」、「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殺漢軍數百人」，此從少說至多；一則證羽之失人心而為獨夫也，一則證羽之不以德而以力征也。(二)

未寫項王歌，先寫楚歌，又寫美人和歌，又寫項王泣，又寫左右皆泣，一片兒女深情，筆勢幾於不振；此下忽然換調，銀瓶乍破，鐵騎突出，而以「於是乃上馬騎」、「乃覺之」二語過下，筆勢真如兔起鶻落。(三)

以「大驚」字，收前無數「大怒」字；以「皆泣」字，收前無數「皆懾伏」等字；以「莫能仰視」字，收前無數「莫敢起」等字；後一「笑」字，乃「大怒」字餘影；「皆伏」字，乃「皆懾伏」等字餘波。(四)

(一) (清)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卷一，清《詩禮堂全集》本，第二六一—二七頁。

(二) 同上，第二七頁。

(三) 同上，第二八頁。

當代研究《史記》的著作很多，成就很大，但像王又樸這樣從遣詞造字、文章布局的層面剖析毫芒的評論已成絕響。當前的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所缺乏的正是細讀文本的視角和方法。對於一篇文章的創作水準而言，形式本身往往比內容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式本身即是內容。所以，從文章本身的肌理出發，對文章進行深度的文本細讀，是今後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大家更爲熟悉的金聖嘆也許更能說明問題。從文章批評的水準而言，古往今來恐怕極少有人能與金聖嘆相比。他對歷代古文的批評，精彩紛呈，字字珠璣。比如蘇軾的《前赤壁賦》，一般的解說，大多不外於本文通過寫景、抒情、說理相互融合的手法，表現了作者灑脫清曠的精神世界。這種解析顯然沒有什麼說服力。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一個具有獨特個性的「文體」。古人之所以稱之爲「文體」，是認爲它就像人體一樣，是一個有生命、有個性的獨一無二的個體。而一種萬能的模式，是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一篇優秀作品的獨特之處的。金聖嘆的評點，却令人叫絕，其言曰：「游赤壁受用現今無邊風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領，却因平平寫不出來，故特借洞簫嗚咽，忽然從曹公發議，然後接口一句喝倒，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妙甚！」〔二〕這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此文獨特的藝術匠心。再如他評《屈原賈生列傳》的傳贊，說：「先是傾倒其文章，次是痛悼其遭遇，次是嘆詫

〔二〕 張國光點校《金聖嘆批才子古文》，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五二三頁。

其執拗，末是拜服其邈曠。凡作四折文字，折折都是幽竇、蕭瑟、挺動、扶疏。所謂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更不分何句是贊屈，何句是贊賈！」^(一)三言兩語，便指出了其中句法、層次的獨特之處；而且，藝術的剖析與情感的揭示水乳交融，全然不同於那種將思想性與文學性截然分作二途的刻板做法。金聖嘆對《水滸》的評點，更是心細如髮，入木三分。在金聖嘆的心目中，小說也是文章，他評《水滸》，用的其實也是文章學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第九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侯火燒草料場》，金聖嘆敏銳地指出：「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二)「此回大火拉雜，却以星星之火引起。」^(三)這不就是文章學中的「前有伏綫，後有餘波」嗎？尤其是文中寫林冲離開草料場去買酒禦寒，臨行前把火炭蓋了，金聖嘆批道：「寫出精細，見非失火。前許多「火」字，都是假火，此一句一齊抹倒，後重發出真正「火」字來。」^(四)這不就是文章學中的「草蛇灰綫」嗎？再如第二十三回，潘金蓮見到了英武神勇的武松，心中的欲望之火燃燒起來，由於長期得不到真正的愛情，所以其內心的興奮可想而知。金聖嘆發現，

(一) 張國光點校《金聖嘆批才子古文》，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七五頁。

(二) (明)施耐庵著，(清)金聖嘆批評，陸林校點《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九二頁。

(三) 同上，第九五頁。

(四) 同上，第九六頁。

自從潘金蓮見了武松之後，一口一個「叔叔」，「一路「叔叔」之聲多於「嫂嫂」，讀之真欲絕倒」(一)。直到潘金蓮勾搭武松，舉杯對武松說：「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殘酒。」金聖嘆批道：「已上凡叫過三十九個「叔叔」，至此忽然換作一「你」字，妙心，妙筆！」(二)這不就是文章學中的「反注」筆法嗎？後來，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文中寫道：「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對此，金聖嘆批道：「此時不知武二已到東京否？武大炊餅已賣完否？讀之一嘆！」(三)金聖嘆的批評文字，敏銳、細膩、有卓見、有性靈——天地間竟有如此錦心綉口！

之所以不辭繁冗地舉例，乃是爲了說明一點：金聖嘆的文章批評，古今罕見其匹，而他之所以能達到如此高深的境界，乃在於他深厚的文章學修養；而這又說明，中國古代文章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並未過時，相反具有很強的活力，值得當代學者充分借鑒和吸收。如果當代學者將傳統的理論方法和當代文學理論，包括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結合起來，那一定會將中國古代文章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一) (明)施耐庵著，(清)金聖嘆批評，陸林校點《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一二頁。

(二) 同上，第二一四頁。

(三) 同上，第二二六頁。

所以，爲了推進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深入，當務之急是從歷代文話（包括評點著作）中總結提煉出中國古代文章理論和批評的基本術語、概念、範疇、命題、觀念，並結合文本加以印證，對其進行細緻的梳理和深入的闡釋，明確其理論內涵，從而溝通古今，消除今人的隔膜，激發其理論活力，建構起一套切實可行的古代文章的批評話語體系。

一一

中國古代文章學中的術語、概念和範疇，集中體現了古代文章創作的文化生態、價值取向、審美趣味、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因此，加強中國古代文章的範疇研究，有助於揭示古代文章學中的一些基本審美原則、創作規範和藝術手法，從而爲古代文章的研究和批評，提供一些切實可行的術語、範疇以及分析途徑，使其不再停留於「內容充實」、「結構嚴謹」、「章法多變」等泛泛而談的印象式評價層面，不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舉例而言，「制」這一文體在古代文章創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實際作用，歷代重要作家，包括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大作家都創作了大量的「制」體文章，很有研究價

值；但長期以來無人問津，其原因在於沒有有效研究的途徑和方法，以致無從下手。而王應麟《辭學指南》中的資料表明，南宋文章理論家將「制」的結構一般分爲「制頭」、「散語」、「褒辭」、「戒辭」和「結尾」五個部分，並對每個部分的敘述內容、語體規範和風格要求，都進行了細緻的闡發。如果對這些術語和觀念進行總結、提煉，古爲今用，那就爲當代學者深入研究和批評歷代「制」體文創作，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和評價標準。

中國古代文章批評中的一些句法概念，如起、伏、跌、頓、接、轉、宕、閑、斷等等，章法範疇如賓主、虛實、詳略、正反、順逆、抑揚、開合、起伏、斷續、緩急等等，既生動形象，又簡明扼要，完全可以爲當代學者所借鑒，成爲古代文章研究和批評中的概念和範疇。有了這樣一套概念和範疇，也就無異於擁有了有一種有效的文本細讀方法。無論是方苞的《左傳義法舉要》、王又樸的《史記七篇讀法》，還是張時中的《集左氏筆法》，無不得益於古代文章學的概念和範疇。日本學者竹添光鴻編輯的《孟子論文》，更是如此。就拿開篇第一章來說，《孟子》原文如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一〕}

對於這段文字，如果沒有古代文章學的一套概念和範疇，今人恐怕就會覺得它在寫作上並無特別出色之處，不過是運用了排比手法，語言富有氣勢而已。而在古人的眼中，這段小文却是一篇文法細密的精彩文字：

「王何必曰利」二句，立一篇之柱。中間「王曰」節，應「何必曰利」句，反連用「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作疊勢，此逆頂法也；「未有仁」節，應「亦有仁義」句，反連用「未有仁」、「未有義」作疊勢，亦逆頂法也。結處若仍用前語作收，便屬呆板，故急接「王亦曰仁義」句，而以「何必曰利」倒煞之，收局便緊。只此一篇，開後人立柱、分頂、結案無數法門。

惠王開口便說「利」字，孟子開口便喝「何必曰利」，通篇雖分「利」與「仁義」兩段，其實單破王之言「利」。曰「危」、曰「弑」、曰「奪」、曰「遺」、曰「後」，俱是「利」字反面，故結出「何必曰利」，總是破一「利」字。「利」字起，「利」字結，文有擒住一字，橫說豎說，無不一綫貫串者如此。

〔一〕（漢）趙岐注，（宋）孫奭《孟子注疏》卷一上，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一三頁。

此章主在禁王言「利」，故「王曰」節，痛陳言「利」之害，說得最是危悚動人。

董思白《論文九字訣》，一曰「反」，蓋反言最能聳動人精神也。如此篇若正言「仁義」，梁王必聽而欲卧矣；惟用反接，將「利」字害處說得痛快淋漓，而以仁義之必無此害作收，則「利」之不當言較然矣，非輕言仁義也。蓋必拔去「利」字病根，而後可與言「仁義」也。可知作文不知用反筆者，斷不能說透題目也。

文字須知翻空出奇、波瀾頓宕、詳略相間之妙。如此文「而已矣」下，忽有「王曰」云云，撰出虛景，如海市蜃樓，聳人耳目，此翻空出奇也；自「王曰」至「百乘之家」，如黃河一氣瀉下，其勢直矣，「萬取」三句，將筆提起，如水勢作一洄洑，而愈覺其汹涌，此波瀾頓宕也；求利之害已痛言之，仁義之利復如此痛說，則文字累贅不靈，看他只將上邊一掉轉，而意已足，是多少簡勁跳動，此詳略相間也。

仁義之益人國，多矣，豈止不「遺」、不「後」而已？曰「遺」、曰「後」，實從上「弑」、「奪」生下，此二句不過於上節作一反照也。〔二〕

這些精彩的評論，將整段文字的章法、句法、字法的微妙之處，分析得可謂淋漓盡致。顯然，這比簡

〔一〕「日」竹添光鴻輯錄《孟子論文》卷一，日本奎文堂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刻本，第一——二頁。